

- 第11屆考試委員及首長著作彙編 • 第二章 考選議題
頁 II-331 ~ II-336

回首原民考試路

考試委員 浦忠成

* 本文民國 99 年 5 月發表於《文官通訊》，第 8 期。

不如漢語系族群早在 3000 年前就創造文字，也有那樣綿長的科舉傳統，台灣原住民族一直要到 19 世紀末才遭遇第一種「國語」（日本語文），上個世紀也學習第二種國語（華語文），中期才面對制度性的考試。眾所週知，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因為人口、規模等因素，並未發展出一套書面語言（文字）的系統，其文化的傳承、意志的表述、情感的抒發都是依賴著口頭的語言。17 世紀，台灣南部的西拉雅族曾經學習由荷蘭傳教士所教導的拼音方式，用以閱讀《聖經》（《福音書》），這項拼音文字算是原住民族首次使用系統的拼音文字，除了用以進行宗教閱讀外，當時族人也用以記錄生活如金錢往來、契約訂定等；如《番俗六考》¹ 所記：

習紅毛字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湛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符檄，錢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貯藏腰間。

隨時攜帶用以寫紅毛字（即羅馬字）的鵝管，可見當時南部平原上的平埔族群部落族人已經嫻熟這種書寫形式，這種情形甚至延續到荷蘭人早已離開的 18 世紀。巡台御史張湄曾在 1741 年作〈番俗詩〉：

鵝筒慣寫紅夷字，駮舌能通先聖書；何物兒童真拔俗，琅琅音韻誦關雎。

除了提及平埔族人依舊慣寫紅毛字，但是也已經閱讀漢族典籍，能夠琅琅誦讀詩文。台灣在鄭成功驅走荷蘭人之後正式成為漢人社會，平埔族群面對人口相對眾多的漢族，逐漸居於劣勢地位，於是選擇學習漢人的語言與各類生活方式，並認同漢人的各類價值，因此也在部落辦理鄉塾讓孩童就讀，郁永河（1996）《裨海紀遊》記載：

新港、嘉溜灣、歐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就鄉塾讀書，蠲其繇役，以漸化之。

清代更以漢化政策對平埔族「誘而馴之」，黃叔瓚（1996）《臺海使槎錄》提到：

肄業番童，拱立背誦，句讀鏗鏘，頓革侏離舊習。陳觀察大輦有司教之責，語以有能讀四子書、習一經者，復其身，給樂舞衣巾，以風厲之。

主其事者對於認真學習而有成效者，有具體的獎勵。到了雍正年間，更在南北路各

¹ 收於黃叔瓚撰《臺海使槎錄》（1996）。

部落設置平埔族「社學」40 餘所。「番童」學習的狀況，《臺海使槎錄》也有描述：

上淡水施仔洛讀至離婁；人孕礁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於鄆，竟能默寫全篇；下淡水加貓、礁加里文郎讀四書、毛詩，亦能摘錄；加貓讀至先進，礁恭讀大學，放索社呵里莫讀中庸，搭樓社山里貓老讀論語，皆能手書姓名，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日榮陞』數字，尤為番童中善解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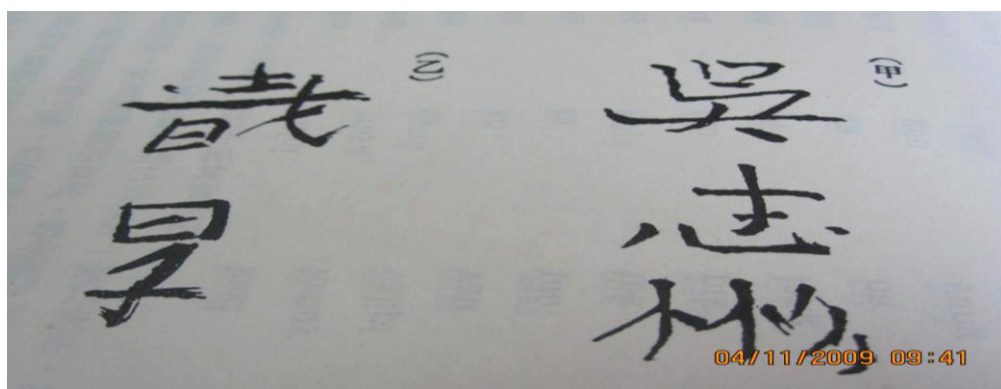
道光年間因為平埔族群遷徙頻仍，社學漸廢而有平埔族「義學」替代。所謂「義學」是「四社公租口糧穀九百石，內抽八十石，永為育才學租，教訓番童，鼓舞後學」，也就是地方人士集資辦學，讓子弟可以接受教育。這時候平埔族群的漢學教育幾已與漢人無異，官府也會以擔任份生作為獎勵，當時讓很多族人趨之若鶩。咸豐年間噶瑪蘭廳辦理鄉試，有加禮遠社的陳照仁（1856）、林同清（1858）、抵美抵社振金聲（1859）、武暖社潘種夏（1861）及同治六年哆囉美遠社林國珍等人成為「生員」（洪敏麟，1972）。這是最早在考場上揚眉吐氣的平埔族人。

相對於平埔族群，居住中央山脈及後山的「生番」族群，就沒有及早遭遇「紅毛書」與誦讀漢文詩書的緣分。儘管沒有現代意涵的學校，但是昔日的部落原本就有其傳遞知識經驗的模式，譬如卑南族的「巴拉冠」（Parakuan，青年會所）、阿里山鄒族的「庫巴」（kuba，男子會所）等就是青年男子學習歷史文化知識與戰鬥、生活技能的場所；而年輕女性往往由部落的女性長者擔負教導、訓勉之責，教育的場所在家族內部。過去部落的知識由史官、祭司、巫者（醫）、耆老、征將等負責保存與傳承，雖然沒有考評的形式，但是每一個成員在整體部落的空間，個人資質與品行的優劣與否，有無顯著的勞績事功，都難躲公眾的鑑衡，公議也就適時形成。

清同治年間，牡丹社之役後，「開山撫番」之議起，撫化「生番」成為治台要務，光緒之後開始辦理「生番」教育，在卑南廳、恆春縣、鳳山縣、阿里山、宜蘭廳、臺北城設立「番學堂」十餘所，以《三字經》、〈訓番俚言〉作為教材，授以讀書、寫字、倫理、教化及閩南語等。對於阿里山鄒族的教化是光緒 13 年在「南仔腳曼」社²（今南投縣信義鄉久美部落）建立學堂，招來 20 餘名「番童」，聘請客

² 這是筆者母親所屬的部落。

家籍的教官負責教學工作，據說教官管教非常嚴厲，動輒斥罵，不到一年，「蕃童」全部逃走，由於沒有學生可教，教官也只好離去，學堂因此廢去。20 多年後日人據台，察知這段往事，就想方設想找到昔日就讀該學堂已經成年的「校友」，請他們按著記憶寫一寫過去學得的文字，但是他們大多已經忘記，僅一、二人可以寫出近似的字體，其他只能寫出類似物體的象形文或者難以辨識的圖畫（如附圖片 1、2）³，這是難得一見的「蕃童」字帖。



(1)



(2)

³ 圖 1 還能看得出是（甲）「吳志彬」（乙）「載亨」或「載高」；圖 2 除了有清晰的鹿、鳥象形體及「國」、「目」等字外，其他就難以辨識。

光緒 16 年於臺北城設的「番學堂」，課程包括讀書、習字、作文、官話、閩語等，教材有《三字經》、四書、《詩》、《書》、《易》。肄業「番童」悉令住校，薙髮結辮，著漢人衣褲帽鞋，廢「番名」而取漢式姓名。衣食文具皆由官府提供，每月考核，成績優異者給予賞銀，修業三年卒業。到了光緒 18 年該學堂已經出現了「準同生員」，即「番秀才」（林衡道，1977），在原住民族社會是相當難得的。在日人森丑之助的《生蕃行腳》（楊南郡，2000）一書記載著有一位曾在這所「番學堂」卒業並獲得「番秀才」資格的泰雅族青年 Siron⁴ 回歸部落的情況：

Siron 曾經於清國時代受過漢人教育，他在台北府就讀八年，已中秀才，學成後，被囑咐化育蕃社子弟；但是回到蕃社後，因為本身業已開化，反而與蕃人社會格格不入，走到了一個歧路，現在是脫離蕃社好呢？還是拋棄知識回歸自己的蕃社好？他終於想通了，「江山洵美是吾鄉」，沒錯！把百卷圖書拋向溪谷，自己撕破儒服，恢復蓬髮赤身的原來面目。從此與人交談時，絕口不提上過學堂的舊事，假如有人強問，只提筆寫道：山中無曆日，四海皆兄弟。再問，則沉默以對。Siron 熟悉台灣土話和北京官話，能文善寫。據說，去年日本商社老闆土倉龍次郎曾經帶他到內地，遊覽奈良、京都、大阪、神戶等地。

Siron 孤獨的在部落從事化育的工作，但是部落嚴密保守的氛圍與難以突破的禁忌，讓他無法獨力面對，所以他只有拋棄所學，回歸部落文化範疇，才能重新融入部落。

日治初期，日人只培育極少數信任的「模範蕃童」，期待他們日後能成為管理部落的助手，但是 1930 年霧社事件起，擔任警察的賽德克族人花岡一郎、花岡二郎

⁴ 又名「詩朗」，伊能嘉矩（1996）的《台灣踏查日記》也曾經提起這個人，但是當時他已經完全恢復部落族人的樣貌。伊能嘉矩寫著：「…走了十多町，便遠遠看到十多個男女蕃人正在坡地上耕作，他們看到我們便紛紛聚集過來，我的舊識 Siron 也在內。當年劉銘傳在台北府開辦蕃學堂教育蕃童時，Siron 就是從蕃社兒童中被挑出來入學的，無論是北京官話、台灣土話，甚至經書、詩賦，樣樣都學得很好。但是現在呢，卻是一個斷法紋身的番丁！據他說：當年從蕃學堂返回蕃社時，身上還戴著學堂所發的衣冠，攜帶著經書。當他走進深山時，不免觸景生慮，再三思考後，把經書全拋向溪谷，同時把舊日衣冠脫掉，丟棄於路旁。回到蕃社後，又恢復到袒裊裸體的舊態了。」（70-71）

最後竟然追隨族人一起對抗日人，日人於是改變策略，在山區普設「蕃童教育所」，廣泛教化部落孩童，傳授日語、簡易算術、體操、農事等科目。日人將學校區分尋常小學校、公學校與「蕃童」教育所三類，並編輯三類教材；分由日人、漢人與平埔族群及平原族群（如卑南族、阿美族等）及高山族群（如鄒族、泰雅族、布農族等）就讀。能夠獲得較高教育而進入公職體系的原住民極為少見，只有僥倖進入師範學校或醫學校（臺北）者才能擔任教師（兼任警察）、部落公醫。1947年赴南京參與制憲的卑南族人南志信就是自台北醫學校卒業的部落公醫。

原住民族能夠參與國家甄拔人才的考試以擔任文官，還是要到戰後。原住民族考試自民國 45 年到 98 年，總計已辦理 28 次，錄取約 3,000 人，目前原住民族擔任公務人員人數已近 7,000 人，佔全國公務員人數的 1.97%。這項考試為原住民族行政體系甄拔相當數量的原住民族籍的公務員，讓民族行政的主體性及參與國家行政事務的程度大幅的提升；這群公務員與醫護人員、教師、警察、職業軍人逐漸形成原住民族社會的中間階層，取代傳統部落世襲或自然成形的領導管理系統。這樣的趨勢也顯示：原住民族原本植根於族群、部落的運作組織、經驗與文化，已經被「現代」的行政體制與學科知識所取代，族人必須開展視野，走出部落的侷限，踏上再也無法回頭的前進之路。這是世界上許多原住民族邁向現代化、進入國家體系必須面對的轉變。由無文的部落走向現代的考場，象徵著原住民族已經跟現代的世界同步，這段歷程值得回顧。

參考文獻

- 伊能嘉矩（1996）。《台灣踏查日記》。台北市：遠流。
- 洪敏麟（1972）。《臺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台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林衡道（1977）。《臺灣史》。台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郁永河（1996）。《稗海紀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黃叔璥（1996）。《臺海使槎錄》。台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楊南郡（2000）。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市：遠流。